

# 古籍的考辨

洪湛侯

考订古籍的真伪、时代和作者，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，也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有些古籍真伪难分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：古代书写工具笨拙，当时的简册为巫史所掌，世代相传，很难考定为某代某人所记；古人不自著书，《论语》为孔子门人所记，《管子》则亦后人记述，故有管仲身后的记载；且古人所述，一般都是为了应用，其书的著者姓名往往湮没弗彰，后人凭揣测题名，往往多不可信。我国古代各地区的方言差异很大，文字又屡经变迁，由甲文而籀文而小篆而隶书，每一次文字变革，简册书籍都须经过翻译传写，难免有改动和失真的地方。但是秦汉以后的伪书，情况则又有别，出于后人有意伪造者居多，其作伪缘由和所采方式又有各自的特点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谓：“常人贵远贱近，向声背实”，故“八卦”托名伏羲，《本草》托名神农，《内经》托名黄帝，这都是托古人之名以相号召，三国魏王肃作《圣证论》驳难郑玄，竟至伪造《孔子家语》作为立论依据，这是想在学术上战胜对方；唐代牛李之争，宋代王安石变法前后，都曾有人编造一些伪书攻击对方，这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。但更多的伪书，则是书贾为了牟利，蓄意作伪，滥刻滥印，流毒至广，这种风气，明代后期最为突出。另外，也有一些伪书，出于好事者所为，玩世不恭，自欺欺人；有的是随意拾补，

冒名凑数，书中混入伪篇，这也是原因之一。唐代王建的《宫词》，其中就颇多误入他人的作品。胡介祉校刊王司马集序曾指出：“宫词自宋南渡后逸去其七，好事者妄为补之。”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指出《钱仲文集》中的《江行》绝句一百首，为钱起的孙子钱珣的诗，误入其中。现代的一些唐诗选本，已据此作了订正。偶有误入，自不可作为伪书论列，不过随文述及而已。

有作伪则必有辨伪，去伪存真，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我国的辨伪历史，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诸子略杂家类《大禹》三十七篇，注云：“传言禹所作，其文似后世语。”道家类《文子》九篇，注云：“老子弟子，与孔子并时，而称周平王问，似依托者也。”小说家类《务成子》十一篇，注云：“称尧问，非古语。”汉志对上述几种著作，或验之其语，或征之其事，从而指明其为伪作，这对后世的辨伪工作有很大的启发，树立了良好范例。北齐颜之推在他的《颜氏家训·书证》篇里，列举了不少古籍内容中的矛盾现象。如谓“《世本》左丘明所书，而有燕王喜，汉高祖”“《列仙传》刘向所造，而赞云：‘七十四人出佛经’”，颜氏虽未指明这些应属伪书，但他认为已经过后人窜改。至唐代，辨伪的风气，日趋兴盛。国家颁布的《五经正义》已怀疑《史记》所载孔子删诗之说。对于《竹书纪年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家语》等书都产生怀疑，有所议论；刘知几作《史通》，其《疑古》、《惑经》、《申左》诸篇对古书、古史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怀疑；柳宗元作《辨列子》、《辨文子》、《论语辨》、《非国语》等等，这些对宋代疑古辨伪风气的盛行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朱熹是宋代疑古辨伪、冲锋陷阵的主将，他有很多考辨伪书的话，散见于他的《文集》和《语录》里。元末明初，宋濂作《诸子辨》，所辨诸书，凡四十又四，但他毕竟还是站在“卫道”的立场说的，其真正的目的并不全是为了辨伪求真。明代胡应麟作《四部正讹》，内容从诸子扩大到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论及

的书有一百〇四种,而且完全是为了辨伪而作的。他把伪书分成二十类,在卷末又提出审核伪书的八条具体方法,有的现在还有参考意义。清初姚际恒作《古今伪书考》,把当时人们不敢轻议的“经书”如《易传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都放在“伪书”里面加以考辨,虽论证不够详博和精审,有时还以文辞的工拙来判定真伪,是其不足之处,但他大胆辨伪的精神,在当时是有发聋振聩作用的。今人顾实作《重考古今伪书考》,黄云眉作《古今伪书考补证》,对姚书多所订补。马叙伦《列子伪书考》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辨伪学专著。张心澂作《伪书通考》,把前人写过的一些辨伪专著和论文,摘要整理而成,间附按语,阐明己见。此书一九五七年修订本收录考辨的书达一千一百〇四部,是目前一部常用的辨伪工具书。自宋濂的《诸子辨》到张心澂的《伪书通考》,标志着近代古籍考辨工作的进展。但与今天我们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的要求和大规模科研工作的需要,还有着很大的距离,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,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,创造更大的成绩。

学习前人辨伪工作的经验,结合点滴见闻,总结几点,作为进行考辨的参考,未知是否有当:

### 一、 查明传授源流

目录学与辨伪的关系非常密切,通常一些提要式的书目里,常有关于古籍考辨的记载。唐智升《开元释教录序》明确提出:“夫目录之兴也,盖所以别真伪,明是非。”在佛经目录中,有的还专门列有“疑经录”以别真伪。史书(包括地方志)中的《艺文志》或《经籍志》里,不但可以看出各个朝代藏书的情况,学术发展的概貌,更可以从中考察某一部书的流传过程。我们利用各种书目提要,查明书籍的传授源流,版刻特点,对辨别伪书,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

现存的《昭明太子集》题梁萧统撰,实不可信。《四库全书总目

提要》(下简称《提要》)从查考此书传授源流入手,谓“《梁书》本传称统有集二十卷,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唐书·艺文志》并同,《宋史·艺文志》仅载五卷,已非其旧。《文献通考》不著录,则宋末已佚”,发觉此书源流有重大疑点,乃进而重核其内容。书为明嘉兴叶绍泰刊本,凡诗赋一卷,杂文五卷。赋每篇不过数句,盖自类书采掇而来,诗中有数首见于《玉台新咏》为梁简文帝诗,由于当时称简文帝为皇太子,辗转稗贩,故而误作昭明。沿着版本源流的线索,进而找出了致误的原因所在,这的确是考辨古籍的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。《提要》使用这一方法发现的伪书,例不胜举。如题名岳珂所作的《索湖诗稿》,虽其本为鲍氏知不足斋所刊,但“宋以来公私书目悉不著录,不知其所自来。珂序亦无年月”,《提要》从这些疑点追踪查勘,进而分析其书的内容史实和文字风格,疑为伪书。对题名吴瑄所作的《蕉窗蕙隐词》,《提要》也是从“诸家书目皆不著录,诸选本亦绝不及之”进而考出其词系皆刘基之作,书贾冒题吴瑄,售伪渔利。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言鉴别伪书之公例,谓“其书前代从未著录,或绝无人征引,而忽然出现者,什有九皆伪;其书前代虽有著录,然久经散佚,乃忽有一异本突出,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,什有九皆伪。”也都是从查考史志目录入手的。胡应麟《四部正讹》所谓“核之《七略》以观其源;核之群志以观其绪”都是同一个道理。

## 二、查核历史事实

辨伪工作应该是文献学和史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。缺乏史料固然得不出结论,但如果史料不真实,得出错误的结论,后果将更加严重,所以弄清事实,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。故考辨古籍,首先必须辨清史事的真伪。

《白氏长庆集》其中混有伪篇,前人早已致疑,晁公武《郡斋读

书志》，对集中《闻李崖州贬》二绝句，进行考核，谓“以唐史考之，崖州贬时，乐天歿将逾年。”当然绝无可能出于白氏之手。《扬子云集》（汉扬雄撰）中有《润州箴》，谓“洋洋润州，江山秀远，蒋庙钟山，孙陵曲衍。江宁之邑，楚曰金陵，吴晋梁宋，六代都兴。”叶大庆《考古质疑》指出“雄生西汉之末，安得预有‘吴晋梁宋，六代都兴’之语哉？”则此文即非伪篇，至少后人已有所增益。

《列子》之为伪书，已为学术界所公认，马叙伦《列子伪书考》是考辨《列子》为伪书的集大成的专著，其书举二十事辨之，有不少都是从考辨史料立论的。如谓：“《周穆王》篇有驾八骏见西王母事，与《穆天子传》合，《穆传》出晋太康中，列子又何缘得知？”“《周穆王》篇言梦，与《周官》占梦合，《周官》汉世方显”，“《汤问》篇与《山海经》同者颇多，《山海经》乃晚出之书”，列子更无从寓目。上述这些史料的先后早迟，都可以看出伪作者剽窃之迹。据此作出的结论，是最有说服力的。

### 三、查考作者生平

古人所作传记、碑铭之类，对其人的生平事迹，重要著述，言之惟恐不及，因而考辨古籍的真伪，查核作者生平的传记，也是一个重要途径。《提要·史部·编年类存目》有题名李焘的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十八卷，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和李焘本传惟载焘有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而无此书之名，此书体例与《宋史》全文约略相似而阙漏殊多。故《提要》判断为“当时麻沙坊本，因焘有《续通鉴长编》，托其名以售欺”的膺品。

《斜川集》十卷，题宋苏过撰。因书中内容与作者时代经历不符，暴露出作伪的痕迹，“考晁说之所作苏过墓志，过卒于宣和五年，此集中所称，乃嘉泰、开禧诸年号，以及周必大、姜尧章、韩侂胄诸人，过何从见之？其中所指时事，亦皆在南渡以后，尤为乖刺。”

清代编《四库全书》的时候，发现刘过《龙州集》所载之诗与此尽同，所以《提要》判断此书“盖作伪者因二人同名为过，而钞出冒题为《斜川集》以渔利耳”。从上述的例子看来，凡作者时代和书的内容有明显出入，或作者传记根本未载曾有此种著作，就有必要引起注意；如果发现书中所载事迹，明显在作者时代之后者，可断其书为伪，或者杂有部分伪篇。

#### 四、 分析作品内容

这个方面涉及的范围比较广，书中的历史事实自然应包括在内，但上文已有专项论及，这里且就作品所表现的学术思想、文体、文法、语言文字（包括特定时代的方言）以及一些称谓、提法等等，作为考辨古籍真伪的参考条件来略加讨论。

任何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都有它的时代特征，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，要掌握这些特点首先必须对当时的社会形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，从而掌握这一时代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，把作品纳入这个特定范畴之中，分析比较，找出其相符或矛盾之处，以为判断真伪的参考，因为考虑到有些原著，其产生时代固然很早，但经过写定、流传、增补、润色，难免与原貌有所出入，我们却不能据此就断为伪书。至于各个时代的文体、文法、文字风格等等，就显得具体一些，经过比较研究，不难辨其异同。如旧诗中的“排律”一体，唐、宋、元皆未有，直到元末杨士宏选《唐音》，方才以“排律”标目，明初高棅选《唐诗品汇》，仍之不改，便一直沿用下来。《孟浩然集》标有“排律”之体，故《提要》认为已有误入，断非原本。《山谷精华录》题黄庭坚撰，任渊编，而其书列有五言排律之名，作伪之迹显而易见，其属于“伪题编者”亦已毋庸置疑。这些都是就文体方面判断古籍真伪的显例，至于从语言、文法等方面考辨古书取得成果的莫如瑞典人高本汉《左传真伪考》，高本汉把《左传》和《论

语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国语》等书比较，发现《左传》所用的方言虚字和代词，与其他古书不同，与鲁国其他书籍也不一样，《左传》所用非鲁语，因此他认为《左传》非孔子作，亦非孔门弟子作，也不是司马迁所谓“鲁君子”作的。他推测当是另一人或他的同一学派中数人所作。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推测，但却有一定的根据。至于古书中出现的称谓、专用名词以及某些特定的提法，往往是考辨真伪最好的线索。马叙伦《列子伪书考》曾指出“《周穆王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，儒生之名，汉世所通行，先秦未之闻也。”仅仅抓住“儒生”这一个名称，就把伪作《列子》的时代上限，限制在汉代以后了。由此可知，凡古籍中出现后代的人名、谥号、地名、朝代名，则其书即使并非全伪，至少也经过后人的窜改或增益，这应该是可以断言的了。至于过去有些人仅凭所谓其书“内容浅陋”或“文体不古”断为伪作，具体掌握起来，却缺乏严格标准。柳宗元《辨列子》谓“其文辞类《庄子》，而尤质厚，少伪作，好文者可废耶？”宋濂《诸子辨》误认《鬻子》不是伪书，理由只是“其文质，其义弘”，宋濂《诸子辨》又谓“（《列子》）若书事简劲宏妙则似胜于周（《庄子》）”，都是单从文辞着眼，最后竟被作伪者蒙混过去。

## 五、 研究版刻特征

我国的刻书事业，始于中、晚唐，而唐、五代刻本流传下来的已极为少见。宋元版书，现在已经是珍本了。宋元以后出现的伪书，除了考核它的内容史实以外，一般还可以结合版刻特征来进行判断，上文提到伪题苏过所撰的《斜川集》，在版本上面也露出伪作痕迹，如每页补画乌丝，染纸作古色，冒充宋槧，还伪镌汲古阁毛子晋藏印于卷末。伪题任渊所编的《山谷精华录》，称宋元祐间版刻，又说失其版心，显然是冒充宋版，并且集中诗文已有崇宁年间作品，何以能预刻于元祐之时？真是矛盾百出！但对于这样一部伪书，

向来藏书之家珍为秘籍，以名取之，不核其实。这是很值得引为教训的。

对于宋元以来各个时代的版刻特征，通行的一些版本学的专书，多有论及，我们从各个时代刻书的版式、书口、行款、字体、墨色、纸质、以及有无牌记、讳字等等，进行鉴别，多实践，多接触，从中自可摸索出一些规律出来，尤其是纸色、墨香、字体刀法等等，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实践，才能真正领会，得心应手，辨明真伪。这里必须一提的是遇到特殊情况如何辨别？比如说元刻本多黑口、赵孟頫字体，但也有例外，如杭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《玉海》，就不是黑口而是白口，纸质白而厚，在元刻中是稀见的；而明初刻本，自洪武至成化、弘治，多黑口赵体，盖其时仍承元时风气。遇到这类情况，就要结合书籍内容来考核判断了。另外还可以参考一些鉴别版本的专书和论述版刻的笔记杂考，如明叶盛《水东日记》、屠隆《考槃余事》以及《善本书经眼录》、《宋元行格表》，记载版刻的目录、善本书的“集锦”、“书影”等等，以帮助识别。总之，从版本方面发现古籍的疑点，亦有助于进一步考辨其书的时代和真伪。

史料考辨不能单凭孤证立论，上述的几种考核方法，最好能够综合运用，多掌握一些线索和根据，作出的结论，才可望比较正确，或者可靠性大一些。另外，必须认真鉴别真伪的程度，是全伪还是混有伪篇，是半真半伪还是真伪杂糅难以区分，其伪作部分是否出于后人之所增益等，都必须尽可能作出实事求是、恰如其分的判断，写成提要，便利文史工作者和古籍阅读者用作参考。